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领域特征研究 ——基于元首外交对话分析的视角

曲教廷¹ 沈云怡¹ 杨云¹ 张大康^{1,2} 任孝平¹

1.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国际评估处 北京 100081

2. 常州市武进区西湖街道 常州 213161

摘要: [目的/意义] 元首外交对话通常代表了国家合作意愿, 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可以了解中国面向“一带一路”众多国别的合作领域特征与差异, 助力合作者根据国家意愿开展合作部署。[方法/过程] 分析梳理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 元首外交对话中涉及合作领域的相关内容; 构建了合作领域的分类字典, 并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各国的合作领域进行统计分析; 结合共建各国的国家发展阶段、地理距离以及所属多边机制(框架), 从三个维度对合作领域进行交叉对比分析。[结果/结论] “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更加倾向“一带一路”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民心相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广泛基础, “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极大发扬, 未来, “一带一路”将向安全领域、对非合作和人与自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延伸。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元首外交; 合作领域; 交叉分析

中图分类号: G35 D822

Research on the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plomatic Dialogue between Heads of States

QU Aoting¹ SHEN Yunyi¹ YANG Yun¹ ZHANG Dakang^{1,2} REN Xiaoping¹

1.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Evalu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2. Xihu Street, Wujin District, Changzhou City, Changzhou 21316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diplomatic dialogues between heads of states usually represent the willingness of countries to cooperate. Research based on these can illu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in China's cooperation fields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基础研究国际合作跨境数据管理研究”(L2124029)。

作者简介 曲教廷(1989-), 博士, 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科技政策、国际合作、“一带一路”; 沈云怡(1995-), 硕士,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估、科技政策、国际合作; 杨云(1972-), 硕士,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估、科技政策、国际合作; 张大康(1995-), 硕士, 研究实习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估、科技政策、国际合作; 任孝平(1984-), 博士,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估、科技政策、国际合作, E-mail: renxiaoping@ncste.org。

引用格式 曲教廷, 沈云怡, 杨云, 等.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领域特征研究——基于元首外交对话分析的视角[J]. 情报工程, 2024, 10(2): 27-37.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and help partners to deploy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national will. [Methods/Process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bs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cooperation fields involved in the diplomatic dialogues of the heads of states since the First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of cooperation fields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cooperation fields of China and countries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g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multilateral mechanism (framework) of the co-construction countries, it conducts cros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fields from three dimension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Belt and Road”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lowe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People to people bond is the broadest basis for 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Belt and Road” is a great promotion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the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will further develop and extend to the security field,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nd “people and nature”.

Keywords: Belt and Road; Head of State Diplomacy; Fields of Cooperation; Cross Analysis

引言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揭开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道路。十年来,“一带一路”从愿景化为现实,基础设施“硬联通”促进经贸畅通往来、规则标准“软联通”推动各国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各国人民“心联通”实现各国人民交流互助和能力提升。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各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领域日益丰富,涵盖了基础设施、产能、经贸、数字、绿色、文化、卫生等多个维度、多种类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各领域合作进入深水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新时期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一带一路”合作工作指明了目标。由于“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广泛、国别众多,国情和地缘特征各不相同,而中国面向不同国家需求不

同,因此与不同共建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领域侧重也有很大差异,这使得相关研究人员很难对中国面向“一带一路”的领域合作特点有直观的感受,管理决策者和合作双方均难以全面了解和系统把握“一带一路”范围下各国的合作契合点,无法聚焦重点、按需施策。因此,分析和研究国家意愿下中国面向“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需求特点以及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领域上的合作差异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1 文献回顾

目前,学者们围绕“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包括:“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合作领域、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领域,研究中采取的方法包括文献计量分析^[2-4]、专利分析^[5-6]、政策文本分析^[7]等。

在“一带一路”各国合作领域方面,谢刚等^[8]围绕数字通信领域,开展了“一带一路”跨国专利合作网络研究;张玉^[9]聚焦普惠金融领域,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该领域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总结了普惠金融在

“一带一路”辐射区域内的空间特征。张超等^[10]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消费领域，分析了沿线国家粮食消费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解释了影响因素。国外学者在合作领域研究方面则更多从评判分析的角度研究不同领域合作的挑战，如Bega等^[11]重点关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项目，讨论评估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对合作国的主要意义和挑战。Lu^[12]从数据安全和政治影响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数字领域合作的风险和挑战。Tortajada等^[13]探讨了“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在重建全球粮食供应链和发展粮食安全方面的挑战和影响。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方面，吴建南等^[14]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的科技合作态势；邸玉娜等^[15]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各阶段投资决策的动因，以及距离和区位因素影响；王腊芳等^[16]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相互影响以及关联因素。此外，也有学者基于所在省市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国别选择进行了研究，如王睿等^[17]以重庆为样本，研究分析了省市发展“一带一路”的国别选择并提出了经贸合作建议。

总体来看，目前学者们尚未开展中国国家顶层意愿层面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领域分析，尤其是缺乏结合国家主观意愿对未来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合作动向进行预测判断。本文将全面分析梳理习近平主席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领导人对话中提及的合作领域，深入研究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领域分布特征，旨在直观地展现中国与共建国家在合作领域上的需求，为不同领域的合作者在“一带一路”选定重

点合作区域国别提供助力，也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首外交中的重要讲话，直接代表了中国政府与各国的合作态度。因此，分析各重要外交场合中提及的合作领域，既可以在宏观层面展现中国对外合作的战略侧重，也可以在微观层面反映具体合作方向。本文梳理了2017—2022年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元首的通话、会谈、互致信函等公开信息（共224条）。通过对全部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和领域词频分析，结合中国政府各部门职能分工，共凝练出安全发展、民生保障、生产建设、经贸投资、科技变革、人与自然等6个一级领域；安全与地区事务、防灾减灾、粮食安全、减贫、农林牧渔、卫生健康、文化教育、产能与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能矿资源、交通运输、贸易、投融资与金融、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绿色与生态、空天探索、气候变化、海洋合作等19个二级子领域，具体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本文将在上述领域分类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

表1 本文分析描述使用的领域名称及其归类

一级领域	二级领域
安全发展	安全与地区事务、防灾减灾、粮食安全
民生保障	减贫、农林牧渔、卫生健康、文化教育
生产建设	产能与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能矿资源、交通运输
经贸投资	贸易、投融资与金融
科技变革	数字经济、高新技术
人与自然	绿色与生态、空天探索、气候变化、海洋合作

从国别分布看，151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非洲52个、亚洲40个、欧洲27个、大洋洲11个、南美洲9个、北美洲12个，本次统计的双边元首外交中涉及领域的国家共有121个，其中非洲42个、亚洲34个、欧洲19个、大洋洲9个、南美洲8个、北美洲9个。中国直接提及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具体领域最多的合作国家有四个，均提到了全部19个二级领域中的12个，分别是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2.2 样本特征

对不同领域出现的频次以及各领域涉及的国别数量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需求最多的一级领域分别为民生保障、生产建设和经贸投资（图1），这也对应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的概念，如民生保障对应民心相通、设施联通对应生产建设、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对应经贸投资，突显了元首对话对“五通”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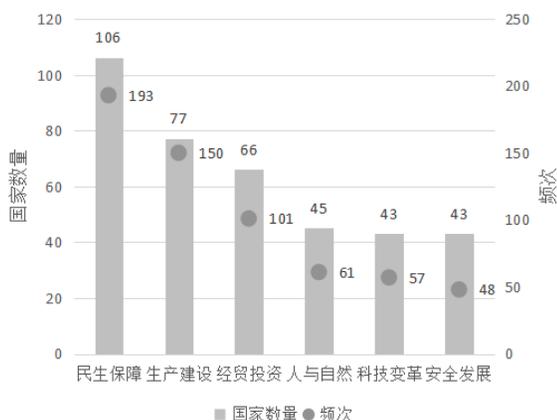


图1 一级合作领域对应国别数量及频次

进一步对二级领域频次进行统计（图2），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健康。

从更加细分的视角上看，卫生健康、能矿资源、数字经济、绿色与生态等二级领域还包含部分子领域。其中，卫生健康领域包括抗击疫情、疫苗研发、医疗卫生、生物医药、中医药等；能矿资源领域包括传统能源、矿产勘探、光伏能源、风能、核电等；数字经济领域包括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通信、物联网和5G等，绿色与生态领域包括低碳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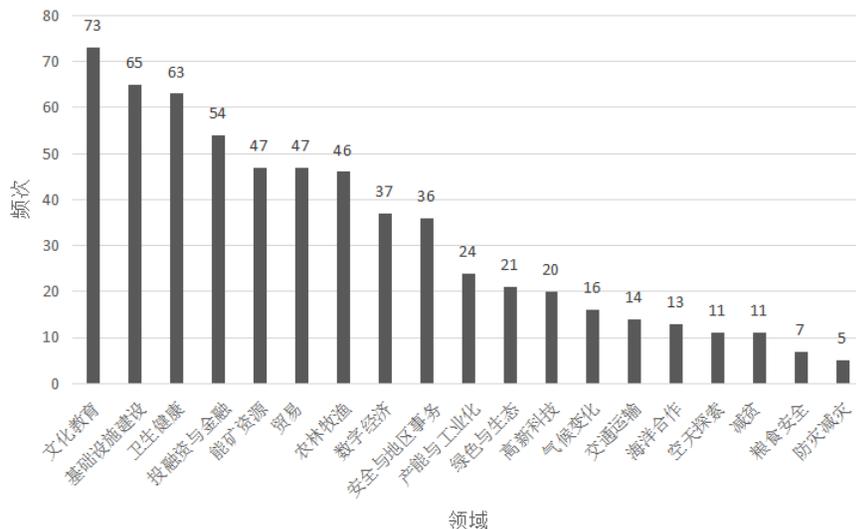


图2 二级合作领域频次分布

环境治理、野生动物保护、生态保持等。可以看出，在更加微观的视角下，二级领域开始出现更多技术细分领域，表明实现各领域合作的初始动力体现在具体的技术领域合作上。习近平主席曾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可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

3 合作领域的多维交叉分析

3.1 合作领域与国家发展阶段的交叉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国家发展等级划分^①，将不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别标记为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通过计算可以对合作领域和国家发展等级两个因素进行交叉分析。由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数量并不相同，因此需要进行控制变量去除不同发展水平等级国家的数量差异，从而可以在定量层面分析各领域下的国家发展等级情况的均衡性。因此，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中不同发展等级占比定义为基准占比。

将国家等级定义为编号*i*（取值为1,2,3,4），分别对应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一级领域定义为编号*j*；共建国家总数为*N*，提及*j*领域的国家数量为*N_j*，其中*i*等级国家数量为*N_{ji}*。则提及*j*领域的*i*等级国家数量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总数的比例*P*为：

$$P_{ji} = \frac{N_{ji}}{N} = \frac{\frac{N_{ji}}{\sum_{i=1}^4 N_{ji}} \times N_j}{N} = \frac{N_{ji}}{\sum_{i=1}^4 N_{ji}} \times \frac{N_j}{N} \quad (1)$$

定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i*等级国家的数量占所有共建国家数量的比例为*R_i*，为消除共建国家中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数量间的差异，引入*R_i*对式（1）进行修正，获得提及*j*领域的*i*等级国家数量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总数的修正后比例*Q*为：

$$Q_{ji} = \frac{\frac{N_{ji}}{R_i}}{\sum_{i=1}^4 \frac{N_{ji}}{R_i}} \times \frac{N_j}{N} \quad (2)$$

根据式（2），最终计算各领域不同等级国家的修正后占比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消除基准占比差异后单一领域单一发展等级国家数量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总数的修正后比例(单位:%)

	高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安全发展	4.56	5.68	9.22	9.01
民生保障	15.62	17.92	20.65	16.01
生产建设	15.41	12.77	15.54	7.27
经贸投资	14.78	10.67	14.42	3.84
科技变革	14.15	6.41	7.21	0.71
人与自然	10.48	6.09	10.30	2.93

从提及不同领域下的国家发展等级角度分析，计算每个领域4个等级国家的修正后比例

的均值和标准差并作图（图3），用于比较各个领域下不同等级国家的均衡性。可以看出，

①委内瑞拉使用2019年的划分等级；巴勒斯坦、纽埃、库克群岛未在清单中，本文暂不讨论。

提及经贸投资和科技变革两个领域的国别发展等级有明显偏离均衡的特征，而民生保障和安全发展领域的国别发展等级更为均衡，说明在科技变革和经贸投资领域，中国的合作目标更为聚焦，而在民生保障和安全发展领域，中国的合作意愿具有广泛分布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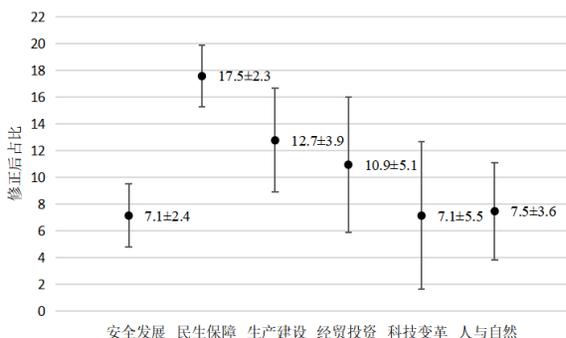


图3 涉及一级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数量占共建国家总数的比例(经修正后的均值和标准差)

结合表2中的数值进一步分析可知，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在科技变革领域的合作倾向较为明显，这是因为科技变革多数发生在高收入国家，而中国作为创新能力较高的国家之一，科技合作的需求更多会偏向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与其他收入群体国家开展合作时，同样十分尊重对方的合作意愿，确保双方能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和攻关。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关心经济发展，而科技变革需求仅存在于经济转型期；另一方面，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其首要任务是保障民生和安全，因而不大会关注科技创新。

在经贸投资领域，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合作倾向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开展经贸投资合作无论是通过对外投资和贸易获取收益^[18]，还是接受境外投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19]，其目的

都表现在直接获利上；而中国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则更多表现在经济援助目的，同时也通过援助带来国际关系升温、市场份额获取、国际话语权提升等隐性收益^[20]。反观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中国的经贸投资贡献不如高收入国家，而“受援”需求也不如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因此中国与其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倾向明显偏低。此外，从竞争因素角度考量，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上跃跃欲试，希望获得产业自主能力。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大规模经贸投资合作可能会冲击自身产业链。因此，中国与高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开展经贸投资合作，对自身发展的竞争影响较小。

依据表2数据，计算每个发展等级国家所提及的6个一级领域的修正后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图4)，用于比较中国与各等级国家所提及不同领域的均衡性。可以看出，合作国收入越高，提及合作领域的均衡性越好，说明中国与收入越高的国家合作意愿越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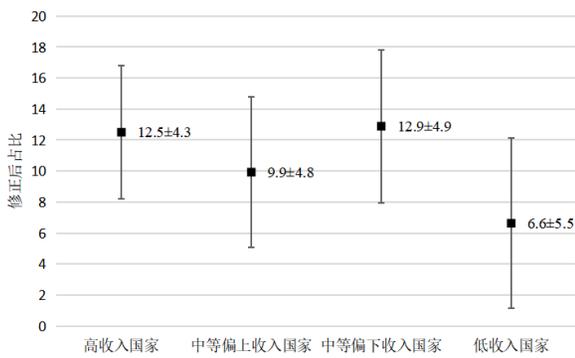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发展等级国家一级合作领域占比(修正后均值和标准差)

3.2 合作领域与国家地理距离的交叉分析

根据CEPII数据库中geodist数据，将151个共建国家与中国的距离进行分组，每1500公

里进行划分并统计平均提及的二级领域数量作图（图5），去掉距离在15000公里以上的6个南美洲国家偏离度较大的数据，可以看出中

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领域数量基本随距离增加呈现递减情况。表明中国与距离越近国家的合作范围越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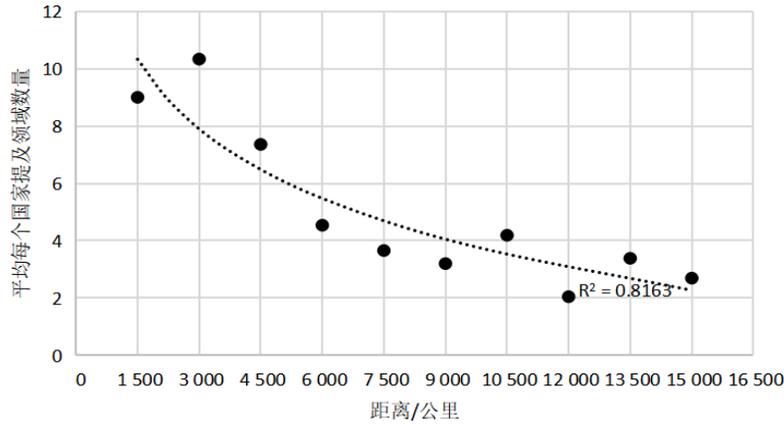


图5 合作领域对应国家数量与距离中国地理距离的拟合关系示意图

分析每个一级领域在每个距离分组中被提及的国家数量占比，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梯度（图

6）：3000公里以内、3000-4500公里、4500-6000公里以及6000公里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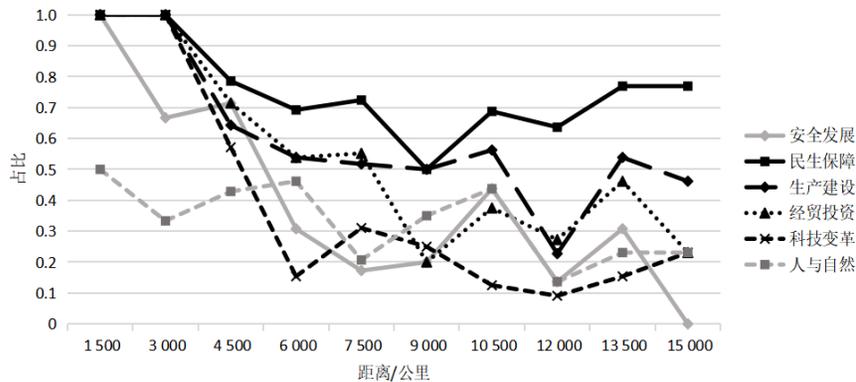


图6 每个一级领域在每个距离分组中被提及的国家数量占比

将上述四个距离梯度分别界定为 I、II、III、IV 四个环形区域，各距离分组内某领域的国别平均占比大于 0.8、处于 0.4-0.8 之间以及

0.4 以下分别视为该领域强、中、弱合作，则各个区域范围描述以及各领域合作强弱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3 不同距离范围内各一级领域的合作强度

距离区域	环形距离范围描述	合作领域					
		安全发展	民生保障	生产建设	经贸投资	科技变革	人与自然
I	东亚、东南亚邻国	强	强	强	强	强	中
II	中亚、南亚邻国及东南亚非邻国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III	中东、南亚非邻国	弱	中	中	中	弱	中
IV	中东欧、西欧、非洲	弱	中	中	弱	弱	弱

在 I 区内, 各一级领域除人与自然领域外均呈现强合作的特征, 表明中国对东北和东南两侧周边国家极为重视。在 II 区内, 中国与各国的合作呈现中等强度合作特征, 这主要由于地理距离拉大, 相互合作成本上升, 需要有侧重开展。在 III 区内, 安全发展和科技革命两个领域的合作呈现弱合作强度特征, 表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和南亚远端地区的安全发展合作意愿相对减弱, 而考虑到安全因素, 科技变革领域的合作也受到影响。在 IV 区内, 经贸投资和人与自然领域也开始呈现弱合作趋势, 这一方面是由于区域内国家数量多、国别差异大, 中国仅对部分国家保持了合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 经贸投资、科技变革以及人与自然领域的合作对人力物力财力有了较高的要求, 而地理距离影响了这种较高成本的合作; 同时, 由于民生保障和生产建设领域合作通常可以在合作国就地取材和开展工作, 因此受距离影响相对较小。总体上看, 中国在民生保障、生产建设 and 人与自然领域与共建国家合作相对受地理距离影响较小, 安全发展、经贸投资和科技变革领域受

地理距离影响较大。

3.3 合作领域与多边机制(框架)的交叉分析

考虑到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又分属于不同的多边机制(框架)或区域性合作组织, 本文进一步从多边机制(框架)的角度对合作领域进行了分析。如图 7 所示, 不同地区间相互对比呈现出以下特点: (1) 中国更加重视与东盟、中东欧以及拉共体国家的科技变革领域合作, 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高, 且有更强的发展意愿。(2) 中国与中东欧和拉共体国家的合作较少涉及安全发展领域。分析具体原因,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历来受到西方国家的高度警惕, 而安全领域合作更是美欧关注的重点。因此中国并不希望引起误会, 王毅^[21]就曾明确表示,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涉及防务安全领域。而对于拉共体国家, 由于受“门罗主义”影响, 美国和拉美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外交关系^[22], 中国与拉美地区开展安全合作不仅可能受到合作国的猜忌, 而且必然会触动美国神经, 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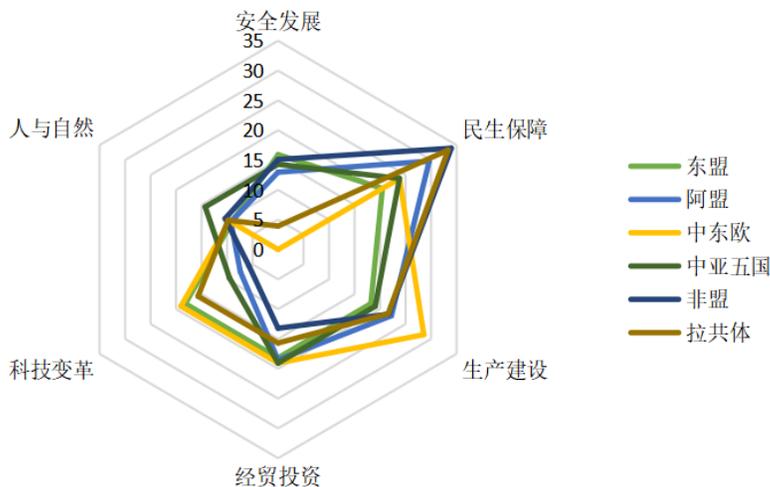


图 7 不同地区内提及各一级领域的国家占比分布

带来麻烦。(3)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更加聚焦人与自然领域,这是由于中亚国家的环保和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尤其是东亚季风会为中国东部南部带来夏季湿润的水汽,而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在陆地上接壤,自西而东来的沙尘暴、河流枯竭等恶劣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4)中国与非盟和拉共体的经贸投资合作较其他地区占比较低。这主要由于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无法像亚欧大陆以及东南亚近邻国一样,拥有便利廉价的交通运输渠道。也正是由于这两个地区与北美、欧洲在地理位置上更近,与其贸易也更为便捷。加之两个地区长期受殖民统治影响,与美欧之间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从习惯上,这两个地区与美欧的

贸易合作更具优势。

在二级领域上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卫生健康、贸易、投融资与金融、数字经济等;与中亚五国的重点合作领域为卫生健康、能矿资源(主要指绿色能源和天然气)、投融资与金融、文化教育;与阿盟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能矿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健康和文化教育;与中东欧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是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投融资与金融和数字经济;与非盟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健康和文化教育;与拉共体国家重点合作领域包括卫生健康、基础设施、能矿资源、农林牧渔和文化教育。此外,也可以分析得出中国在重点领域的主要合作国家(详见表4)。

表4 中国与“一带一路”不同地区合作重点关注领域及合作领域最广泛的国家

多边机制(框架)	最关注合作领域	合作领域最广泛国家
东盟	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健康、贸易、投融资与金融、数字经济	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
中亚五国	卫生健康、能矿资源、投融资与金融、文化教育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阿盟	能矿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健康、文化教育	沙特阿拉伯
中东欧	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投融资与金融、数字经济	捷克、波兰
非盟	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健康、文化教育	埃及、南非、坦桑尼亚
拉共体	卫生健康、基础设施、能矿资源、农林牧渔、文化教育	阿根廷、智利

4 结论与展望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已经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发展倡议。中国在与共建各国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真正将元首外交中提及的合作领域落实落地,取得了大量的务实合作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本文通过分析元首外交中提及的合作领域,及其与国家发展阶段、国家

地理距离、多边机制(框架)的对应关系,研究总结了中国在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需求结合点和利益交汇点。总体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更加倾向“一带一路”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这体现了中国与共建国家合作既要提升自身实力又要广泛施援的特点,这也与各国的发展道路相吻合。习近平主席曾多次提到对外合作的

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开放创新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是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的理念创新。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两方面理论的有效实践,更加突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

其次,民心相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广泛基础。本研究结果上看,无论是与各共建国家提及的内容中出现的频次,还是对不同发展等级和不同地理距离和领域的分析,民生保障领域都是最重要和最广泛的合作领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到的,共建“一带一路”要“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中国愿意也希望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同提高民生水平,实现共同繁荣。

最后,“一带一路”依然可见古丝绸之路的影子,同时也对历史精神和文化传承进行了极大地发扬。从距离上看,合作领域较广泛的国家大多集中在6000公里范围以内,基本覆盖了中国向西直到黑海的区域,与古丝绸之路覆盖的范围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拉美国家的广泛参与,让“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局限于亚欧大陆,而是彻底覆盖了全球。从合作领域上看,除民生合作以外,生产建设和经贸投资是最为广泛的合作领域,这与古丝绸之路的兴建道路、促进贸易的行为模式相一致。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新增加了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安全、绿色等议题,极大丰富和拓展了古丝绸之路的内涵,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面向未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无论从合作国范围还是合作领域都会更加广泛,预测可能会有多个维度的发展和变化。

(1) 安全发展领域合作可能会在地理上进一步向外推广。如中国近期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和好、在俄乌问题上的积极举动、对巴以问题在联合国上的积极表态等都展现出中国推动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积极态度。2023年2月,中国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更加表现出中国愿意更广泛地开展安全合作的意愿。(2) 与非洲的合作水平将全面提升。虽然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制约,中国与非洲合作难以全面展开,但随着非洲人口、经济的扩张,必然会加强与中国在经贸、科技、环保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描述,非洲是所有主要地区中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预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翻一番,非洲对世界的影响能力将不断增强。(3) 人与自然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2021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必然也必须肩负更多的责任,携手更多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一带一路网.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EB/OL]. (2023-06-25) [2023-06-26].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 [2] 丁洁兰, 杨立英, 孙海荣, 等. 基于文献计量的“一

- 带一路”区域及沿线国家科研合作态势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6): 626-636.
- [3] 周静梅, 黄颖, 汪雪峰, 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态势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计量分析[J]. 情报工程, 2016, 2(4): 69-79.
- [4] 刘光阳, 邓大松, 梁小江. 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综述——基于定量和图谱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 2017(1): 11-18.
- [5] 高珺, 余翔.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合作特征与技术态势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 303(7): 169-178.
- [6] 叶阳平, 马文聪, 张光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现状研究——基于专利和论文的比较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 2016(4): 60-68.
- [7] 马志云, 刘云, 杨国涛, 等. 国家愿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0, 292(8): 177-188.
- [8] 谢刚, 邵季雯, 李文鹤.“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通信领域跨国专利合作特征及网络演化研究[J]. 技术经济, 2022, 41(2): 15-25.
- [9] 张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J]. 投资研究, 2022, 41(9): 127-142.
- [10] 张超, 杨艳昭, 封志明,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消费时空格局[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6): 1398-1412.
- [11] BEGA F, LIN B.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energ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the power projects[J]. Energy, 2023, 270: 126951.
- [12] LY B. Challenge and perspective for Digital Silk Road[J]. Cogent Business & Management, 2020, 7(1), 1804180.
- [13] TORTAJADA C, ZHANG H. When food meets BRI: China's emerging Food Silk Road[J]. Global Food Security, 2021, 29, 100518.
- [14] 吴建南, 杨若愚.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合作态势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1): 14-20.
- [15] 邸玉娜, 由林青.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动因、距离因素与区位选择[J]. 中国软科学, 2018(2): 168-176.
- [16] 王腊芳, 谢锐, 阳立高, 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向溢出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20, 360(12): 153-167.
- [17] 王睿, 李佳明, 李佳. 省市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国别选择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 341(5): 177-184.
- [18] 佟家栋. 对外贸易依存度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分析[J]. 南开学报, 2005(6): 16-22.
- [19] 沈坤荣, 耿强.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82-93, 206.
- [20] 蓝庆新, 韩羽来. 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合作障碍与对策[J]. 当代经济管理, 2017, 39(9): 1-5.
- [21] 外交部. 王毅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三个引擎”协同发力, 何乐而不为[EB/OL]. (2021-05-30) [2023-04-28]. https://www.mfa.gov.cn/web/wjzbzd/202105/t20210530_9137391.shtml.
- [22] 吴晓春, 汪世林. 门罗主义——美国拉美政策的基石[J]. 当代世界, 2006(7): 37-39.